

蒋孔阳 朱立元主编

曹俊峰 朱立元 张玉能著

XIFANG

MEIXUETONGSHI

西方美学通史

第四卷

德国古典美学

XIFANGMEIXUE TONGSHI

理念的感性显现。
——黑格尔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西方美学通史》

谨以此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50周年献礼

上海文艺出版社

蒋孔阳 朱立元主编
曹俊峰 朱立元 张玉能著

西方美学通史
第四卷 德国古典美学
XIFANGMEIXUE
TONGSHI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王志伟

西方美学通史

第四卷 德国古典美学

曹俊峰 朱立元 张玉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a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125 插页 5 字数 628,000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903-3/1·1537 定价：45.50 元

序 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只有德国的美学才和美学之名相称。”^① 这不仅因为美学之名是由德国美学家鲍姆加登于 1750 年最先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西方美学史的一座高峰——德国古典美学。正是从德国古典美学开始，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美学在哲学中的地位，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等，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美学问题才有了比较肯定而明确的规定。从德国古典美学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它是对古希腊以来西方美学的批判性总汇；从西方美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德国古典美学是西方美学发展史上继古希腊美学和启蒙主义美学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而且是西方近代美学的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峰；从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来看，它又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美学思想和潮流的直接或间接的来源。

1790 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发表，标志着德国古典美学的开始。1838 年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三大卷全部出齐，标志着德国古典美学达到了高潮。而 1842 年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第 1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

理》出版，则宣告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和解体。从此以后，西方美学便沿着三个方向发展：从德国古典美学的根源上分别形成了俄国平民美学（又称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各色各样的西方现代美学。因此，一般认为，康德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黑格尔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终结者，而费希特、席勒、谢林、歌德等则是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的必然逻辑锁链的几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国古典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它的直接影响，在德国的文学和艺术发展进程中还相应地形成了与德国古典现实主义相并行的德国浪漫主义。这些德国浪漫派的文学艺术家们，不仅从事文艺创作，而且关注并研究了美学（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因而可以把德国浪漫派（耶拿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看作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附录。

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得好：“1781年，发生了三件在美学史上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件。莱辛的逝世切断了新的文艺复兴和旧的文艺复兴，即拉丁文艺复兴和希腊文艺复兴之间的最后桥梁；席勒的《强盗》的发表继续揭开天才时期的序幕——这一反动之于莱辛，犹如莱辛之于高特雪特；《纯粹理性批判》的问世开始了一场哲学革命。这场革命后来由美学问题和美学资料通过相互的溶合加以完成。当《判断力批判》在1790年发表的时候，这个哲学问题已经被抽象地加以解决了，……这种抽象的解决只需要经过具体的发展，就可以既变成一种真正的艺术哲学，并对未来的一般思辨产生重要影响。”^①

^① 鲍桑葵：《美学史》，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一 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

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美学思潮,为什么就必然地出现在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呢?其中当然有着十分深刻的民族、时代、社会、文化和哲学、美学等内在的原因。

首先,德意志民族的内向、深沉、善于思辨的民族特征,为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准备了内在条件。

丹麦著名文艺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这样说道:“德国人的性格是如此内向和深沉。”^①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正像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②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也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③

德意志民族的这种性格特点,是在民族形成的艰难历程中逐步积淀而来的。德意志民族是在日耳曼王国建立之后(公元六世纪)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名称,而日耳曼民族最初的历史是与罗马人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直至凯撒时代(公元前一世纪),日耳曼民族还处于蛮荒阶段。在日耳曼各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第23、30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

部落的迁徙过程中,日耳曼人屡遭罗马人的打击,因而逐步形成了部落联盟,并在与罗马人的不断斗争中于五世纪末建立了日耳曼人的国家——法兰克王国,加之语言和文化的因素,德意志民族就逐步形成了。正是在这种长期动荡和艰苦斗争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德意志民族铸就了这种内向、深沉和善于思辨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在以后的中世纪基督教信仰和近代宗教改革(马丁·路德,1517年)的影响下,愈发变得鲜明。^① 宗教改革的结果,一方面形成了宗教的分裂、争斗,分别形成了新教联盟(1608)和天主教联盟(1609);在波希米亚发生的一个地区争端导致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德意志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并形成诸侯割据,从而使得德意志民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方面落在了英国和法国的后面,因此德国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们更多地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世界的彼岸——思想观念界,产生了许多思想体系,从而巩固了德意志民族的内向、深沉和善于思辨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使得德语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严谨、明确、逻辑缜密、表述清晰的近代德语,给善于沉思默想的德意志民族提供了一种恰切适宜的工具,更有效地巩固了德意志的民族性格特征。正是在这长期的积淀和巩固的基础之上,终于形成了启蒙主义时代以理性主义为基准的批判精神(莱布尼茨、沃尔夫)。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正是德意志民族的内向、深沉和善于思辨的民族精神在哲学文化上的表现,它不同于法国启蒙主义的务实的

^① 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历史,详细情况可参阅杜美《德国文化史》第7—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第1—44页,三联书店1991年。

理性主义倾向，也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往往具有更多的折衷基调。正是这种理性批判精神，合乎逻辑地使鲍姆加登成为了独立的美学学科的创始者，也促使康德开创了德国古典美学基业。

其次，十八世纪末的德国的社会现实和德国市民的阶级特征也促成了德国美学的产生。

关于十八世纪末的德国现实状况，恩格斯有一段经典性的描述：“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① 总之，这是一个落后、畸形的社会。这样深刻、严重的社会危机蕴含着活跃的社会革命的契机。然而，德国当时的社会状况造就的，不是能够担当起革命重任的资产阶级，而仅仅是要求改变现状，实现理想的“理性王国”却又不愿付诸实际行动的、鄙俗的市民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

^①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第1页。

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① 这样的德国市民阶级,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衰颓不堪。“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中。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但是,一俟无可辩驳的事实把理论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一俟法国宫廷和法国人民在实践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虽然他们在理论上的联合已为 1791 年理论上的宪法所确定),一俟人民通过‘八月十日’事件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主权,尤其是当 1793 年 5 月 31 日吉伦特派的覆亡弄得理论完全哑口无言的时候,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 1789 年 8 月 4 日晚上贵族阶级放弃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料到,这种行动实际上产生

^①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第 15 页。

的后果绝不同于好心的理论家可能做出的结论。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称赞这些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后果对于许多有关的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相当不愉快的。所以，所有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们从奴颜婢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侣挑战的令人颤栗的行动了。”^①

德国古典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康德、席勒、费希特、歌德、谢林、黑格尔，起初几乎都曾经对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谢林、荷尔德林和黑格尔，作为大学生在图宾根学院的校园内亲手种下了“自由之树”，席勒也接受了法国国民议会因革命戏剧《强盗》而授予他的“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但是，1793 年雅各宾专政以后，他们忍受不了人民革命的暴力行为，血与火震慑了他们的理想化心灵。他们同时对贵族的腐朽和人民的暴力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因为他们希求的不是现实的暴力统治，哪怕这是人民群众的暴力，而是理想化的和谐相处，一种各阶级相安无事的乌托邦。因此，康德作为软弱无力的市民阶级的理论代表，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人们信念所在的彼岸世界。所以，马克思称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②。席勒则在法国国王路易

①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第 2 页。

② 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同上书，第 38 页。

十六被人民处死的时刻,要求充当路易十六的辩护人,无论在理论著作(《审美教育书简》)、诗歌(《大钟歌》)还是戏剧(《堂·卡洛斯》)中都表示了对暴力革命的坚决反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方略:通过审美王国使人们走向政治的自由。席勒主张,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先改造人的心灵,使人性完整起来。费希特也这样认为,他说:“只有心灵的改善,才导致真正的智慧。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的整个生活不停地奔向这唯一的目的吧!”^①他认为,“我们人类的使命就是把自身联成这样一个唯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一切部分都彼此有透彻的了解,到处都得到同样的文化教养”^②。尽管费希特对法国大革命作了很多的肯定,甚至包括暴力革命,但是最终他还是把一切都归于自我及其善良意志和自由意志。谢林也顺着这个思路把审美直观和艺术当作人类的自我完成,最后鼓吹“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黑格尔则把现实生活的一切都颠倒为绝对精神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发展。最后他们两人的哲学都成为官方的御用哲学。总而言之,德国古典美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反对德国落后、畸形现状的一场理论革命,是一场特殊的精神领域革命的丰硕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德国古典美学是从改变落后、畸形的德国现实出发,而为了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方式而进行的一场精神领域的革命,这一革命与德意志民族性格和市民阶级特征相耦合而产生了一种寻求人类自我解放的特殊形态的革命思索。所以,德国古典美学的逻辑起点就是这种寻求人类自我解放方式的革命思索,它是近代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新兴资

^{①②} 费希特:《人的使命》,《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193、17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产阶级革命要求的延伸。它继承了启蒙主义运动的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和要求,但是把这种革命局限在人类心灵的领域,因而它本身是一朵不结果实的美妙绝伦的奇葩。

再次,德国古典美学是综合欧洲启蒙主义美学中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大主流的必然成果。

西方美学发展到十八世纪,出现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而在认识论范围内产生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主要在感性经验的范围内论述美学问题,而大陆(法、德、意)理性主义美学则主要在理性观念范围内论述美学问题,因而在一系列美学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然而,两者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想的范畴,在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的共同斗争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阐发,在发展中出现了某些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融合的趋势。在英国,出现了以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为代表的理性化的经验主义美学,又被称为剑桥派新柏拉图主义美学。在德国,出现了以鲍姆加登、赫尔德和莱辛为代表的注重感性的理性主义美学。在法国,狄德罗的以“美在关系”为核心的“情境说”和“整体论”的美学思想也使感性与理性的尖锐对峙得到了缓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意大利(以1725年维柯的《新科学》的出版为标志)和十八世纪后半期的德国(以1764年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的面世为标志)开始,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逐步兴起、发展和系统化。因此,美学的研究一方面与审美趣味和艺术的历史演化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具有了动态的视角。这样就使得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得到了历史的考察,并使研究者深感这种矛盾对立在实际审美过程和艺术之中是对立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的,而且这种对立矛盾在发展

中必然会经历一个正、反、合的演进过程。

当维柯把眼光投向人类历史发展的时候,他已经感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洛克的经验主义都是片面的,从而提出了“认识凭创造”的综合两者的命题,并且提出了诗人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是人类的理智的观点,从历史的发展上肯定了理性和感性的合理性,从而把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诗人的神学)→英雄时代(英雄的神学)→人的时代(理智的神学)。并把诗性智慧和哲学智慧对立起来,实际上是把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当作一个综合的人性发展过程,只是他要求感性和诗性智慧发展到理性和哲学智慧,从而在人性(心灵)的创造中综合两者。因此,维柯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在美学中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先河,只是由于他的发展观是单向的、线性的,缺乏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因而只是表现了综合的意向,却更多地揭示了感性和理性在思维中的对立的一面,同时揭示了综合的可能性——人性的心灵创造。可以说,维柯跨出了综合的第一步,而且是重要的一步,因为,既然人类的历史由来自人性必然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所决定,那么,再往前发展呢?这就必然引导人们进一步去思索。所以,维柯的后继者赫尔德就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这样一个发展序列: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哲学时代。这种序列实际上与维柯的分法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赫尔德把一切的发展追溯到了自然的起点,因此,他把感觉当作思维的基础,而又强调思维对于感觉的发展高层次性,所以指出思维对于感觉的指导作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人通过感觉获得事物的尺度,然后以一定的尺度去进行感觉,就把人类认识中的感觉(感性)与思维(理性)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从而对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偏执一端是一种纠正,并显示出综合两者的发展趋势。

当温克尔曼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审视古希腊艺术时,他也发现在古代艺术作品中人的感性和理性是明显矛盾地并存在一个整体上的。比如,拉奥孔雕像,在感性的肉体上表现的是痛苦,而在理性的精神上却应该包含着忍受痛苦的心灵宁静,所以,拉奥孔在巨蟒缠身时不能张口大声嚎叫,因而美与表情在造型艺术中是矛盾的,美是内在理性的,而表情却是外在感性的,却又要统一在一个整体上,所以表情(感性)要服从美(理性),这样也是一种统一感性和理性的方式。然而,这种解释遭到莱辛的反对。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就是要以美为最高法则,因此,他把美与表情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美是感性的,而表情则是理性的,表情(理性内容)要服从美(感性形式),这又是一种统一感性和理性的方式。而在赫尔德看来,这两种统一两者的方式都有偏颇。他认为,宁静之美是由希腊古代的总体生活决定的神性美,这种神性美(理性美)化作人体表现出来,所以古希腊人的神和英雄本身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即感性和理性上)同样完美的人,因而宁静是古希腊一切艺术的共同特征。这就从人的自然本性上把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并以此说明了古希腊艺术的美的特征。这三位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和统一感性和理性的方式,但是,他们在要求感性和理性在作品中的整体上,在美中统一起来,却是一致的。

正是在这种统一感性和理性历史要求的影响下,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人对审美和艺术中的感性与理性关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综合路径,要求把经验派美学与理性派美学结合起来,形成比较完善的美学理论。康德关于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美的无概念的普遍性,美的无利害的愉悦性,美的无概念的必然性;席勒关于美是现象中的自由,美是综合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

的游戏冲动的对象，即活的形象；谢林关于美是在有限之中表现无限；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等，都是这种综合经验派美学和理性派美学两大思潮的具体的美学成果。这一方面说明了没有启蒙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两股对立潮流的发展，就不会有德国古典美学，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表明德国古典美学的逻辑起点就是要造就一个完整的人的类形象，一个把感性与理性融合为一体的人类的美的形象。

第四，德国古典美学也是十七一十八世纪自然科学革命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按照英国自然科学史家斯蒂芬·F·梅森在《自然科学史》中的分析，十六一十七世纪是科学革命的时代，而十八世纪则是“民族科学传统兴起”的时代。^①的确，这三百年，尤其是十七一十八世纪，是一个科学革命的时代。它上承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科学之光，下启十九世纪工业和学术的伟大变革，对于人类理性的开发和拓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然，这一时期的科学革命和发展也为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准备了科学理性的条件。

其一，十七一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和发展激发了思想家们的怀疑精神和开创新型思想体系的理性智慧。

从十五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唤醒的人们对于中世纪蒙昧的思想体系（神学）的怀疑已经日渐突出，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大胆地否定了被神学奉为金科玉律的托勒密的地心说，并且由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18—1621）等具体研究的贡献而逐步建立起了新的宇宙

^① 梅森：《自然科学史》，第117—3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运动的学说体系,替代了从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的宇宙静态模式;在整个十六世纪,科学发展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逐渐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即实验方法,并且由英国的威廉·吉尔伯特(1540—1605)的《磁力论》(1600)和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学术的进展》(1605)和《学术的伟大复兴》(1620)进行了总结,对古希腊以来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玄思的演绎法为主的科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和补充;伽利略的许多力学和天文学发现,诸如惯性运动原理,自由落体运动和加速度,抛射体的飞行轨迹,太阳黑子,月球表面的山岭,特别是由他完善起来的科学的数学—实验方法,不仅更加有力地传播了哥白尼体系,而且更有力地撼动了旧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体系;到了牛顿(1642—1727)的时代,经典力学的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并且运用数学使其更加成熟起来,成为二十世纪以前物理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体系;此外,在光学中光的波动说的兴起使得光的微粒说的独霸地位受到挑战,在医学中血液循环的理论,经过弗兰德斯人维萨里、巴黎大学医学院的迈克尔·塞尔维特、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哥伦布、乔尔丹诺·布鲁诺的不断研究,最后由威廉·哈维(1578—1657)正式确立,在化学领域中由炼金术逐步形成了医学化学和燃素说等近代化学的观点,而且许多科学成果在航海、机械、化学、天文观测、地理测量等具体运用中得到充实和发展,从而突破了旧世纪的蒙昧,带来了科学理性光芒的普照人间。

这种科学理性之光,当然也使得德国古典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豁然开朗起来,他们中不仅有些人自己也研究过自然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科学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科学的怀疑精神被激